

## 历史

## 合理的外交理念 矛盾的外交实践

## —— 赫鲁晓夫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背离原因分析

陈宪良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列宁根据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变化,从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点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赫鲁晓夫执政后,进一步推行这一原则,并将其深化为“三和理论”。赫鲁晓夫除了对西方国家采取缓和的政策之外,还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日渐平等化,强调各国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自主性。但由于苏联不改大国沙文主义及对社会主义阵营行动的统一要求,经常以大国大党自居,侵犯兄弟国家的利益。虽然赫鲁晓夫极力主张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又多次挑起危机,使两国关系几度恶化,导致其外交实践与理念的背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外同事、同行对“三和理论”的怀疑,更有国外对手的不配合。

【关键词】赫鲁晓夫 苏联 美国 缓和政策 “三和理论”

【中图分类号】K51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6-0049-0009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开始逐渐改变日趋僵化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开展缓和和外交。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加快了对外政策的调整步伐。在苏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动示好的情况下,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迹象:苏联与欧洲一些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既实现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首次访美,也使紧张的苏美关系有所缓和。但由于国内同事的掣肘、国外同行的反对及赫鲁晓夫个性特点和外交政策的失误等原因,苏联的对外政策经常遭到挫折,致使赫鲁晓夫常常改变对外政策的初衷。备受争议的外交政策最终成为赫鲁晓夫被赶下领导岗位的重要因素。

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但在本国饱受争议,在

国外,尤其是在中国,也备受关注。但无论世人如何评价赫鲁晓夫,其在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十余年间,给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及世界均带来了巨大影响。

## 一、赫鲁晓夫的外交理念

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为外交思想及其实践两部分,其外交思想更是可圈可点。尤其是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理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对之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均具有一定的影响。“三和理论”是赫鲁晓夫推行与西方缓和政策的核心内容,其中包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作者简介】陈宪良,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后。

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 (一) 和平共处理论

早在列宁执政时期便已提出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斯大林在执政期间也多次强调贯彻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但无论是列宁的还是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均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重新审视苏联的内外形势，开始推行与西方国家缓和的外交政策，将“承认各种制度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sup>①</sup>。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又将“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和平共处”提升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认为今后苏联在外交方面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奉行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积极为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事业而斗争，努力建立各国间的信任，争取把日趋缓和的国际紧张局势转为持久和平”<sup>②</sup>。同时，赫鲁晓夫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他指出：“各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问题，是这些国家人民内部的事情。我们认为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好的制度，但我们不强迫别国人民接受这种制度，我们尊重各国人民，并主张由各国人民决定最合适本国的社会制度。”<sup>③</sup>总体来看，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第一，和平共处的对象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认为，只有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时才存在和平共处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是盟友，是友好与互助的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间没有对抗性矛盾，没有斗争和仇视……因此将‘共处’一词用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上未必恰当。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好和互助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sup>④</sup>

第二，和平共处的内容主要是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共处，而在思想方面则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赫鲁晓夫认为，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主要是双方在政治方面不进行军事对抗，经济方面不互相制裁且彼此间能够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在思想方面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要进行殊死斗争，以争取更多的人信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苏共中央 1963 年的决议明确指出：“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并没有放弃其他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他们主要指望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上的瓦解，指望狂妄的反共宣传。帝国主义者打着反共的旗号，……狂热鼓吹军备竞赛。

他们用各种手段企图对社会主义各国进行‘思想战’。他们在思想上和平共处口号的掩盖下……企图腐蚀思想上不坚定的人。”因此，赫鲁晓夫指出，如果我们“宣扬思想上和平共处，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工农事业的出卖”。“苏联共产党认为自己对苏联人民的首要责任以及对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同仇视人类的帝国主义思想进行不调和的进攻性斗争，保卫劳动人民不受它的有害影响，更积极地使群众接受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经常关心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它的发展和丰富。”<sup>⑤</sup>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是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和平共处的物质基础。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力量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有了无可比拟的增长，而资本主义已经大大削弱。拥有 9 亿多人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长和巩固”。因此，他认为，“由于有了这个阵营的存在，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sup>⑥</sup>。同时，赫鲁晓夫指出，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数以亿计的民众也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因此，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只要各国人民能够动员自己的全部力量同好战的帝国主义者积极进行斗争，就一定能够阻止战争，从而保证和平共处<sup>⑦</sup>。另外，核武器的出现及发展使美苏两国间达到相互毁灭的“恐怖平衡”状态，双方均不敢轻易发动战争。赫鲁晓夫认为，核武器的杀伤力十分可怕，一旦爆发核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人类有灭亡的危险。因此，他一再强调，要“清醒地估计核战争的必然后果，是坚决彻底执行防止战争和动员群众

① [苏]赫鲁晓夫：《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的讲话（1955年5月18日）》，载《赫鲁晓夫言论（1955年）》第四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1960 年编印，第 39 页。

② Хрущев Н.С.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К КПСС XX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14 февраля 1956 г.), [http://www.hrono.ru/dokum/195\\_dok/1956sezd20.php](http://www.hrono.ru/dokum/195_dok/1956sezd20.php)

③ ТАСС.: За дружбу между всеми народами, за мир во всем мире! (Провозглашая Новый тост Хрущева Н.С.), Правда, 2 января 1961.

④ Хрущев Н.С.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58. С.227-228.

⑤ 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第 557 页。

⑥ Хрущев Н.С.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К КПСС XX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14 февраля 1956 г.).

⑦ Хрущев Н.С.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к итогам Совеща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Гос. изд-во полит. литрий, 1961. С.28.

来解决这一任务的必要条件”。他指出：“只要理解了毁灭性战争的威胁，就能加强群众反战的斗争意志。”<sup>①</sup>同时，赫鲁晓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予以新的诠释。他指出，该原理存在两个前提，一个是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一个是不愿进行战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且组织得不好，因而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在那个时候，这个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目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sup>②</sup>。因此，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可能的。

第四，实力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共处的保障。虽然赫鲁晓夫一再宣扬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并多次提议与美国就裁减军备进行谈判，以实现“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是他并未削弱苏联的军事准备，依然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教育人们不要放松警惕性。赫鲁晓夫指出，“为了不致措手不及，苏维埃国家现在和将来都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进一步加强国家的防御力量，教育全体人民和他们英勇的军队，献身社会主义祖国，献身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今后还要大力提高陆、海军的技术装备程度，完善苏联士兵的军事技能、战斗准备和思想锻炼，使他们时刻准备完成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sup>③</sup>。因此，赫鲁晓夫提出，“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将来仍要竭尽全力加强我国的战斗实力，因为帝国主义者还在继续进行军备竞赛”<sup>④</sup>。

另外，赫鲁晓夫认为，一些国家为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是应该被允许的，也应对其予以大力支持。他指出：“只要存在帝国主义，只要存在殖民主义，就会有民族解放战争。这是革命战争。这种战争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殖民主义者是不会自愿让人民独立的。因此，人民只有用斗争，其中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不能把这种起义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局部战争等同起来；……共产党人完全支持这种正义战争，并且走在进行解放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前列。”<sup>⑤</sup>

可以说，赫鲁晓夫通过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得出的“战争可以避免”的结论是其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石。

## （二）和平竞赛理论

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理论是以同这些国家能够“和平共处”为前提的。赫鲁

晓夫认为，多种原因促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只能和平共处，但由于两种社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且双方均欲以己方的社会制度替代对方的社会制度，可他们又很难以武力方式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因此提出通过榜样作用，吸引民众选择最好的制度。赫鲁晓夫指出：“当然，我们有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且我们现在也在谈论矛盾，否认这点是荒谬的。但是，哪种社会制度更好，谁的制度富有生命力的问题，将通过在尊重各国人民主权的情况下的和平经济竞赛来决定。”<sup>⑥</sup>

赫鲁晓夫之所以希望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经济竞赛”来决定未来世界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信心和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赫鲁晓夫指出：“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迈进，没有危机，也没有动荡。它给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福利，显示出其对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决定意义的优越性。”<sup>⑦</sup>在阐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同时，赫鲁晓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现代的生产力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没有消除这种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更加突出。”<sup>⑧</sup>正是这种信念使得赫鲁晓夫产生“帝国主义者害怕和苏维埃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资本主义制度明显经受不起这种竞赛”<sup>⑨</sup>的想法。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是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科技和吸收外国资金的途径与手段。他指出，“同其他国家交换本国产品和为了发展国家经济而利用世界上所创造的最好的一切和符合现代科学与技术

① Хрущев Н.С.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 Коммунист. 1961. № 1.

② [苏]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1956年2月14日）》，载《赫鲁晓夫言论（1956年）》第五册，第29～30页。

③ 《关于党的思想工作的当前任务的决议（1963年6月21日）》，载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所：《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中央全会文件汇编》，第557页。

④ Хрущев Н.С.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⑤ Там же.

⑥ [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答英国〈每日快报〉编辑部问》，载[苏]《兄报》1962年12月31日，转引自《赫鲁晓夫的世界观（1936—1964年言论摘要）》，第108页。

⑦ Хрущев Н.С.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К КПСС XX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14 февраля 1956 г.).

⑧ Там же.

⑨ [苏]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4月26日）》，载《赫鲁晓夫言论（1954年）》第三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238页。

成就的最好的一切”<sup>①</sup>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因此，赫鲁晓夫主张在生产方面同资本主义国家合作。

西方国家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将消灭资本主义作为目标，因此苏联提出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进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仅是一种虚假宣传的口号而已。对此，赫鲁晓夫反驳说：“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这绝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政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我们确信共产主义胜利的根据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sup>②</sup>

### （三）和平过渡理论

关于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各国取得的成就及其巨大的发展潜力会使很多国家民众更加向往社会主义，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觉悟的提高和自主意识的增强，使得其通过议会选举夺取政权成为可能。因此，赫鲁晓夫强调，“至于说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正如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的，将会越来越多样化。因此，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一定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连在一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革命，是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在我们看来，联合和团结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力量，开展群众性的革命活动，是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的必要条件。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为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式的新的、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sup>③</sup>。

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使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信心倍增。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将会起到一个榜样作用，吸引更多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实现社会制度的和平过渡。赫鲁晓夫说：“我们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而是用示范的方法号召人们走向最美好的未来——共产主义。不能用棍子打着人上天堂。当一个人意识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他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他自己会跑来的。”<sup>④</sup>“当

苏联人民享受到共产主义的幸福的时候，世界上又会有几亿人说，‘我们赞成共产主义’。”<sup>⑤</sup>

## 二、赫鲁晓夫的外交实践与其理论的矛盾性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变化。一方面，对西方国家实行缓和政策，主张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使得苏联与一些西方国家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和，但历史积累下来的彼此不信任及冷战思维的惯性时常导致苏联与美国等国家关系出现紧张；另一方面，苏联对待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日渐平等化，更加强调各国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自主性，但由于多年的大国沙文主义习惯，仍在实际中要求社会主义阵营统一行动，苏联时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大国大党自居，进而侵犯了兄弟国家的利益，为发生冲突埋下了隐患，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

### （一）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的矛盾性

赫鲁晓夫执政后，在贯彻缓和政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缓和了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1953年5月30日，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政府声明，“为了维护睦邻关系、巩固和平与安全，可以放弃对土耳其的领土要求”，苏联的声明受到了土耳其的欢迎，使得原本比较紧张的苏土关系得以缓和。从奥地利撤军并做出让步与其签订和约，被看成是苏联领导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成功范例。同联邦德国建交是赫鲁晓夫缓和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又一举措。1955年9月13日，在苏德两国均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此举不但使两国建立了经贸联系，而且使西欧局势得到了缓和。1956年10月19日，苏联与日本发表的联合宣言规定，双方解除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关系，在经贸和国际上加强合作，苏联表示同意释放所有在苏联判罪的日本战犯，同意把齿舞、色丹两岛在苏日和平条约签订以后移交日本，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请求。

① [苏]赫鲁晓夫：《1964年6月24日同丹麦实业界人士的谈话》，载[苏]《真理报》1964年6月25日。

② Хрущев Н.С.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К КПСС XX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14 февраля 1956 г.)

③ Хрущев Н.С.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④ [苏]赫鲁晓夫：《在奥苏协会的讲话（1960年7月2日）》，载《赫鲁晓夫言论（1960年）》第四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0年编印，第256～257页。

⑤ 《赫鲁晓夫的世界观（1936～1964年言论摘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4年编印，第116页。

但是因美日签署安保条约,苏日关系并未得到发展。苏联与芬兰关系也因苏联撤销了其在芬兰波卡拉半岛的海军基地并撤出了全部武装力量而得到发展。

斯大林执政后期,虽然苏联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但是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气息极为浓厚,彼此关系也比较紧张。尤其是苏美关系十分冷淡,双方对抗情绪严重。斯大林去世后,缓和与美国的关系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苏联向其抛出了橄榄枝:首先是推动朝鲜参战各方签署停战协定。1953年3月,苏联政府致电中朝两国,提议应就结束朝鲜战争与联合国军队举行会谈。虽然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同美国进行长期作战的准备,但在苏联缓和国际局势的大方针指引下,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战俘问题上让步,使得朝鲜停战协定最终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远东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1956年1月25日,苏联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缔结苏美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彼此争端,在互利与平等基础上发展和加强双方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sup>①</sup>。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以“休假”为名访问美国,访问期间,米高扬多次呼吁举行苏美双边会谈。1959年9月15~28日,赫鲁晓夫应邀访美,开启了苏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访美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会谈并就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被媒体称之为“戴维营精神”的协议虽然缺少实质性内容,但是这为苏美两国通过领导人以谈判协商形式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脆弱的苏美关系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不久两国又因U-2飞机事件发生争吵,随即,赫鲁晓夫取消了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两国关系再度紧张。

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赫鲁晓夫致贺电,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消除彼此间的猜忌和不信任,加强两国间的合作,并且提出随时准备支持美国关于缓和双边关系的倡议,以建立世界持久和平<sup>②</sup>。随后,虽然苏美两国领导人曾在维也纳举行过会谈,但两国关系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1961年6月,为了解决民主德国的困境,赫鲁晓夫重新就柏林问题发布强硬声明,并为此采取包括暂停实施裁军计划、增加国防预算、召集高级军事顾问会议、任命新的驻德司令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在苏联领导下,华约成员国发表声明,表示如果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对德和约,华沙成员国将单独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并给予柏林“自由城市”地位。随后,民主德国为

了防止国民逃往联邦德国沿东西柏林分界线筑起一堵墙,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切断了双边人员往来,此举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美国副总统及国防部长相继访问西柏林,并在边界线上炫耀武力。美苏两国重新恢复核试验,相互进行核威慑,两国关系再度陷入紧张。

“柏林危机”持续一段时间后,终于在苏联不再坚持1961年年底前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后,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随后又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剑拔弩张。1962年7月,苏联根据苏古两国签署的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核武器的协议开始向古巴运送导弹及军事人员。9月4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绝不能容忍把进攻性地对地导弹或其他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随即,苏联政府予以否认。10月下旬,美国做出海上封锁古巴,并在美国东北部港口集结部队准备空中打击和两栖登陆行动的决定。10月24日,美国海军开始封锁古巴并封锁苏联通往古巴的空中通道,苏联表示坚决反对,两国冲突一触即发。在美国态度强硬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于10月26日发表声明表示,基于美国不再入侵古巴,“推动我们向古巴提供这种援助的动机也随着消失了”,允诺30天内撤走伊尔-28飞机。苏联运送导弹基地物资的船只在公开接受检查监督后返回出发港口<sup>③</sup>。美国随后终止了封锁,危机得以平息。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是赫鲁晓夫为了弥补苏联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差距及帮助古巴防止美国入侵而采取的一种冒险行动。该事件是美苏两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险些酿成两大国之间的战争。虽然两国最后均做出让步,危机得以化解,但是彼此的不信任加深。

苏联主张通过谈判、让步和妥协解决与西方国家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但同时赫鲁晓夫又强调以实力遏制对手,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展开争夺,外交理论与实践发生背离。

## (二) 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矛盾性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赫鲁晓夫当政后,将社

<sup>①</sup> [苏]A.A.阿赫塔姆江、Ф.Д.沃尔科夫等:《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1917—1978)》,《苏联对外政策编年史》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5页。

<sup>②</sup> [苏]赫鲁晓夫:《电贺肯尼迪就职》,载[苏]《真理报》1961年1月21日,转引自《赫鲁晓夫言论(1961年)》第一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2年编印,第94页。

<sup>③</sup>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8~699页。

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昔日苏联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有所收敛，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制”，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涉，加大了对兄弟党国家的援助力度，使得苏联与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加强。但很快，苏联又与波兰、匈牙利发生矛盾，一度欲以武力迫使波兰就范，出兵镇压匈牙利骚乱，大国大党主义暴露无遗。同中国经历一段蜜月期后，又与中国发生了严重分歧，最终导致两国盟友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破裂。

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是苏联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苏南关系的紧张，是斯大林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后果。赫鲁晓夫当政后，主动缓和与南斯拉夫的关系。1955年5月末至6月初，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访问了南斯拉夫，并对苏联的过往表示了歉意。经过会谈，两国签署了联合宣言，表示全面恢复1948年中断的外交关系，在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同时，两国又签署了一系列经济、贸易、信贷等协定。次年6月，铁托访问苏联，双方发表了《关于南共联盟与苏共之间的关系的宣言》。宣言指出，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形式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加强，并且认为，任何一方都不得有强迫对方接受其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形式的见解的任何倾向。文献表明了苏共承认南共联盟坚持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sup>①</sup>。一度紧张的苏南关系得到了改善。但是，苏南关系的改善并未将南斯拉夫完全拉入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拒绝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上签字。1958年南共又发表了内容与社会主义阵营观点不一致的联盟纲领草案。尤其是南斯拉夫对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一致性要求的排斥态度使苏联领导人十分恼怒，除在经济方面对南斯拉夫予以制裁外，还将南共的联盟草案视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次掀起对南斯拉夫的批判运动，苏南关系再度紧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时常表现出大国、大党沙文主义姿态。1956年6月上旬，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苏共对此十分关注，将该事件视为“反人民的骚乱”，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1956年10月19日，波兰党召开八中全会，决定恢复哥穆尔卡的总书记职务。会上，哥穆尔卡对波兹南悲剧发生的原因提出了与苏共不同的看法，这使

苏共感到不安，要求波兰党领导人到莫斯科磋商，遭到拒绝，赫鲁晓夫随即带领包括诸多军事将领在内的庞大代表团飞抵华沙，以对波兰施压。同时，苏军开始向华沙方向推进。苏波两党发生激烈争论。赫鲁晓夫态度蛮横，指责波兰党煽动反苏情绪。波兰党据理力争。最后，在波兰举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自觉理屈的苏共领导人被迫做出让步：承认哥穆尔卡的领导地位；苏军返回兵营；同意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承认苏波贸易中的不平等行为，同意予以补偿等<sup>②</sup>。苏波此次较量的结果表明，苏联一方面并未完全改变其大国大党主义惯性思维，另一方面表明阵营内部各国对大国大党主义思想的强烈不满，由苏共完全主导阵营内部事务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复返。1956年10月，匈牙利爆发民族民主运动，在政府难以控制局势及匈牙利欲退出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予以镇压。虽然事件平息，但是苏联使用武力维持阵营统一的行为遭到了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各国的批评。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思想也遭到西方各国的怀疑。

可以说，苏中关系是苏联最为重视的外交关系之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主张进一步加强对华关系。尤其是急于寻求中国支持的赫鲁晓夫更是主张积极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力主消除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为此，赫鲁晓夫提出交还中国旅顺、大连两港，将苏中合资的四个公司的苏方股权卖给中方，增加对华的援助项目，将在华展出的先进机床赠送给中国，等等。这些举措均体现出苏联积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愿望。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方面，苏联更注重听取中方的意见。总之，苏联在此阶段比较注意平等对待中方。中国在许多问题上也对苏联，尤其是赫鲁晓夫给予了一定的支持。这样，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段“蜜月期”。但是，由于两国对国际形势看法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出现分歧、两国最高领导人个性差异以及双方对正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争论，致使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为逼中国就范，赫鲁晓夫撤出了苏联援华专家，对中共政策予以批判，两党关系迅速恶化，进而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可见其力主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意愿，并为之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在一些事务上平等对待其他

① 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第677页。

② 同上，第681页。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政府还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谊与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该宣言指出,苏联对外政策的坚固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同所有国家的和平、友好与合作政策,这种政策最充分地表现在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上。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各国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联合在一起,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但是苏联及苏共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认识,仍不时表现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霸气。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感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斯大林时期受到苏联的损害,并由此产生了不平等感,不平等感催生的强烈的反抗意识与苏联的控制欲时常发生碰撞,使得赫鲁晓夫根本无法一以贯之地按其外交理念行动,其外交实践常与其外交理念相矛盾。

### 三、赫鲁晓夫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背离的原因

综观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的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可以说,既有亮点,又有失误。但总体而言,赫鲁晓夫的缓和外交理念比较符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相比,虽然赫鲁晓夫理论素养相去甚远,但是这并未影响其理论具有一定的闪光点。而赫鲁晓夫在外交实践方面却不尽如人意,常常采取一些矛盾政策,一些行动甚至违背其外交理念,导致苏联的一些重大外交实践碰壁,甚至是失败。缘何赫鲁晓夫不能彻底贯彻其外交理念,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

#### (一) 国内因素

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都受到本国民众意识和政治家思想的影响,即使在领导人权威性较高的苏联也是如此。虽然赫鲁晓夫执政中后期已经在本国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但其内外政策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内民众和政治精英的影响,这也是影响赫鲁晓夫无法完全贯彻其外交理念的重要因素。

赫鲁晓夫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执政期间的冷战思维。在当时冷战氛围依然浓厚的情况下,这种理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及现实意义,体现了苏联领导人的开拓精神。但是外交理念能否成功贯彻必须要有同行的支持和对手的呼应,而赫鲁晓夫的国际形势观及外交决策既未完全得到国内和社会主

义阵营同志的理解,也未得到对手的配合与响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的冷战使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一批对帝国主义抱有强烈怀疑甚至敌视态度的政治家。包括莫洛托夫在内的一批人对赫鲁晓夫缓和同美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持怀疑态度,更有人不同意对美缓和。虽然莫洛托夫被解职,但持有莫洛托夫这种保守思想的人依然存在。

斯大林去世后,虽然苏联主要领导人大多希望调整内外政策,但是对国际形势分析如赫鲁晓夫那样乐观的领导人并不多,这些人在外交领域步子不能像赫鲁晓夫迈得那么大。当赫鲁晓夫提出缓和与西方国家关系时,虽然很多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人不同意对苏联的让步能否换来西方国家的友好政策表示担心。一旦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响应苏联倡议,或者做出有损苏联的外交行为,那么在苏联便会立刻出现反对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声浪。尤其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党内民主得到改善,不同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许存在,赫鲁晓夫的外交决策不能不受他人的影响。U-2飞机事件便是一个鲜明例子,该事件发生时,赫鲁晓夫正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该事件使赫鲁晓夫左右为难,原本赫鲁晓夫不希望将此事扩大,但美国的行为导致国内许多人要求对美强硬,反对与美国缓和,在国内反对声音异常强大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对美强硬起来。而苏联的强硬又促进原本理亏的美国不甘示弱。赫鲁晓夫无奈拒绝参加期盼已久的巴黎会议,同时宣布取消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导致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古巴导弹危机虽然是因苏联而起,但当美苏两国因此而剑拔弩张时,苏联最终退却,同意撤出在古巴部署的导弹。赫鲁晓夫由于此次冒险失败而在国内地位受到削弱,两年内便被同事赶下了台。

#### (二) 国际因素

可以说,国际因素是影响赫鲁晓夫外交理念及其决策的最重要因素。赫鲁晓夫虽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基本准确,但是其对西方的缓和外交不但没有被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家完全理解,也未完全得到西方敌对阵营的认可与响应,一方的防御举措往往被另一方误读为进攻行为。赫鲁晓夫执政期间,美苏关系总体有所缓和,苏联领导人也实现了访美的愿望,虽然“戴维营会谈”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但毕竟开启了两个超级大国通过首脑会晤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且美国邀请苏联领导人访美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可正当美苏关系趋向缓和、苏联希望通过四国首脑会谈进一

步推动两国关系缓和之时，美国却又派U-2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进行侦察。美国的敌对行为使赫鲁晓夫颇感为难，在国内要求对美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高涨情况下，赫鲁晓夫不得不表现出强硬姿态，要求美国政府向苏联道歉。但艾森豪威尔政府态度也十分强硬，拒绝道歉，赫鲁晓夫无奈之下，拒绝参加四国首脑会议，并宣布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访苏邀请，刚刚缓和下来的双边关系再度紧张。可以说，这种结果是赫鲁晓夫不希望看到的，但美国不配合，使赫鲁晓夫处于尴尬境地，违背其缓和政策理念与美国针锋相对，也属无奈之举。尤其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重要角色的中国在该事件的激烈反应更让赫鲁晓夫毫无退路。

赫鲁晓夫希望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从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而吸引更多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和平过渡。但是作为苏联主要对手的美国并未完全理解赫鲁晓夫的外交理念，也不相信苏联的缓和动机。两国间多年的冷对抗也培养了一批冷战思想浓厚的政治家。尤其是以杜勒斯为首的一些保守主义者多年把持美国的外交，他们不但不响应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呼吁，而且时常制造导致局势紧张的各种事件，这无形中给赫鲁晓夫推行缓和政策制造了障碍。正如赫鲁晓夫所说：“在通向缓和和紧张局势的道路上还有一个杜勒斯。杜勒斯像一条链子系着的狗，盘踞在艾森豪威尔身边，主导着他的行动。这是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极端富有侵略性的人，绝不可能同意与苏联和平共处。”<sup>①</sup>面对内外压力，赫鲁晓夫必然时常收起抛向西方的橄榄枝，换以枪炮与其对峙。而这种对峙往往又加深了西方政治家对苏联缓和政策的怀疑。因此，这种情况下，苏联外交失败也成为必然。

中国也是推动苏联对美强硬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最初对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就有不同意见。只是基于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支持才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认同。但当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政策偏离正轨时，便开始有意促使赫鲁晓夫回头。1958年8月23日，赫鲁晓夫刚刚访问中国回到苏联，毛泽东便下令对国民党占据的金门进行炮击，美国慌乱之中派五支航母群列阵东亚，使得台海危机进一步升级。由于在赫鲁晓夫离开中国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发表了会谈公报，指出“两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因为双方国防部长也参加了会议，所以，使美国误认

为中苏两国已就此次危机达成一致。尤其是赫鲁晓夫在给美国的书信中指出“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后，美国更加相信中苏在炮轰金门的问题上协调了立场。虽然事前对此事一无所知的赫鲁晓夫对中国“炮轰金门”事件的不解，也流露出不满，但美国并不知道苏联对此次事件的真实想法，因此，美国有理由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表示怀疑，认为苏联的缓和政策仅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这种对苏联的不信任使美国很难迎合赫鲁晓夫。而U-2飞机事件后，在赫鲁晓夫本已左右为难之际，作为“局外人”的中国对此反应却异常激烈，《人民日报》不但发表了《对苏联挑衅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衅》的社论，而且毛泽东也多次对外发表讲话大批美国帝国主义性质。这使本无心将此次事件扩大的赫鲁晓夫较为尴尬，加之国内要求对美强硬的呼声高涨，赫鲁晓夫只能在随后的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议上表现出强硬态度。

虽然肯尼迪上台后，苏美关系有所缓和，但肯尼迪咄咄逼人的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相互交织的外交政策再度与赫鲁晓夫的“和平外交”发生冲撞，第二次柏林危机便是两国外交理念冲撞的表现。而第二次柏林危机余波未消，古巴导弹危机接踵而至。古巴导弹危机一方面使苏联意识到自身的劣势，另一方面也意识到立即同美国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想法过于天真，也预示着赫鲁晓夫对美缓和政策遭受挫折。

在对日关系方面，虽然赫鲁晓夫一度希望能与日本签订和约，并为此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但在美国控制日本的特殊的政治环境下，苏日关系难以有大的突破。苏日举行谈判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致函日本首相鸠山一郎，以停止经济援助对日施压。日本外相重光葵提出放弃国后和择捉二岛后，杜勒斯又威胁日本，如果接受苏联方案，美国将永远占领冲绳。美国的干涉使得苏日和谈复杂化<sup>②</sup>。而当苏日终于突破各种分歧和障碍，欲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日本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新条约保留了美国在日本领土上驻扎武装力量和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并责成日本加强军事潜力。这使为苏日缓和做出巨大努力的赫鲁晓夫十分恼火，于是向日本提出严厉警告，并放弃了与日本签订和

<sup>①</sup> [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述波译，第1860页。

<sup>②</sup> 肖月、朱立群：《简明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约的打算。

另外，赫鲁晓夫的个性导致其外交理念与外交实践的矛盾常现。虽然赫鲁晓夫低估了两极状态下缓和两大阵营间矛盾的困难程度，对改善苏美关系所能达到的目标估计过高，但赫鲁晓夫在施行外交政策时也常感情用事，是导致苏联外交失败及赫鲁晓夫外交实践与外交理念相背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在处理中苏关系时，赫鲁晓夫明显表现出感性有余、理性不足的外交特点。在执政初期，赫鲁晓夫因需中国的支持，不但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力度，而且力排众议归还了旅顺、大连两港及与中国合资的四个公司，对待中国也日益平等化。在军事上加大了对中国的帮助，特别是允诺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使得中苏关系达到两国建交以来最好时期。可以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既有真诚一面，也有赫鲁晓夫即兴原因。当中国内外政策与其政治理念相悖

时，赫鲁晓夫不顾两国过往关系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撤出援华专家，使得中方不但经济受损，而且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当苏联专家撤出后，赫鲁晓夫又有些后悔，再次表示可以重新派出专家，而中国没有接受，两国关系渐行渐远成为必然。古巴导弹危机险些引发苏美大战，既是赫鲁晓夫对美国实力及其领导人决心的一个误判，也是其决策轻率的一个表现。最后苏联不得不从古巴撤出导弹。危机虽然化解，但苏联的国际威望也受到了损害，而且加深了美国对苏联缓和外交的怀疑。

总之，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虽然源于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但是当过于理想化的外交理念遇到严酷的外交现实时，必然遭受挫折。

(责任编辑 李淑华)

## Rational Diplomatic Concept and Contradictory Diplomatic Practice —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 of Khrushchev's Diplomatic Idea Contrary to His Diplomatic Practice

CHEN Xianliang

**Abstract:** In the 1920s, Lenin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starting from the point of reinforcing the Soviet power and developing the socialist cause,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changed international class forces. After Khrushchev was in power, he took the principle further and deepened it as "three-peace theory". Besides adopting a mild policy towards the West, he was gradually on terms of equality with the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stressed that every country developed on its own and with its own features. But,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could not give up the great-nation chauvinism and demanded that the socialist camp should take a united action, it always regarded itself as a great power and encroached on the interests of other countries. Although Khrushchev vigorously stood for mitigating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e provoked a crisis for many times and had the relations of the two countries become worse time and again and made his diplomatic practice contrary to his diplomatic concept. The cause for this mainly lies in his home-and-abroad colleagues' suspicion about the "three-peace theory" and his foreign rivals' uncoordination.

**Key words:** Khrushchev; Soviet Union; United States; mild policy; "three-peace theory"